



〔西〕阿尔瓦罗·台·莱格雷西亚著

邓宗煦译

玛芭

玛 芭

〔西班牙〕阿尔瓦罗·台·莱格雷西亚 著

邓 宗 煦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ÁLVARO DE LAIGLESIA

YO SOY FULANA DE TAL

根据 1976 年巴塞罗那行星出版社(Editorial Planeta
Barcelona)出版的第三版翻译

玛 蕊

〔西班牙〕阿尔瓦罗·台·莱格借西亚 著
邓 宗 煦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2,000
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500 册

书号: 10100·489 定价: 0.41 元

责任编辑 汪永标

译者的话

本书是西班牙现代现实主义幽默作家阿尔瓦罗·台·莱格雷西亚的一本著名小说。主要描写西班牙一个残废泥瓦匠的女儿——玛芭沦落的过程。玛芭天真烂漫，窈窕姣好，对未来抱着无限的憧憬，活象一朵含苞欲放的皎洁的芫荽花。但残酷无情的社会现实，象只硕大的黑手，把她摧残，逐步地把她推向罪恶的深渊，最后沦为妓女。作者以幽默的笔触不蔓不枝地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轮廓清晰的现代西班牙的缩影。

通过本书的翻译，想提出几点看法，供读者参考，并望得到指正：

一 “卖淫”这种社会现象并不始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就有妓女：汉武帝时期兵营始设娼妓；宋元以后又有把游艺场所——“勾栏”作为妓院的。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象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的卖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逐步形成的。恩格斯说：“自古就有的杂婚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愈变化，愈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愈大。”（《马克思选集》第四卷，第7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说过：“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269页）

妇女的解放是和社会制度密切相联系的。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妇女的肉体和精神受到摧残，她们的权利、尊严、价值、爱情受到践踏。夏尔·傅立叶首次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人民是否彻底解放的准绳。他有句名言：“一个时代的社会进步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的命运无法改变。

《玛芭》这部小说描写西班牙内战(1936——1939)后的一个沦为娼妓的女孩子的遭遇。时至60—70年代作者写这部小说并三次重版这部小说的时候，象小说主人公玛芭这样的娼妓还遍布西班牙。西班牙皇家学院第一个女院士——卡门·康黛不久前引用该国社会学家孔塞普莎·阿雷纳尔的话说过：“我们西班牙妇女只能做三件事：当美女，做小贩……还有一件事，我就不多嘴了。”因此，这部小说实际上反映了西班牙千千万万受着凌辱的妇女的命运。

其实，摧残女性、憎恶女性的，又何止一个西班牙。世界上叔本华、司特林堡一类人物，还多得很呢！

说到这里，不由地想起鲁迅翻译的赛式加——一个穷途末路的妓女，一个“标致的时候，以肉体供人娱乐，及至烂了鼻子，只能而且还要以肉体供人残酷的娱乐”的天涯沦落人（俄国小说《幸福》——阿志巴绥夫著）。玛芭不管赛式加，是西班牙的赛式加。不仅一个赛式加，还有无数的赛式加遍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她们的命运到头来也只能是“烂掉鼻子，脱光衣服遭人毒打”。这是谁的罪过？——是社会制度的罪过。

二 阿尔瓦罗·台·莱格雷西亚(Álvaro de Laiglesia) 一九二二年生于西班牙的圣塞瓦斯蒂安。早年从事文学活动，曾任幽默周刊《机枪》和儿童杂志《箭》的总编辑。他的笔调殊

为幽默，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是丰富多彩、五色斑斓的。这不仅表现在戏剧上（如：《女凶杀案》，《见不到家庭的悲剧》，《裸体人的丑事》等），而且还反映在电视荧光屏上。但使他成为拥有人数最多的西班牙读者的幽默作家之一的，则莫过于他在小说方面的多产创作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作品，可算：《禁止哭泣》，《尸箱》，《只死笨蛋》，《肚脐都是圆的》，《小姐有多香！》，《你把这告诉你的婶婶！》等等。

阿尔瓦罗·台·莱格雷西亚写《玛芭》是有的放矢的。他借玛芭一类人物的口说：“倘若我们的社会对这类失足事件不那么严厉而是采取较为仁慈的态度，那么，我们中的许多人就可能已重新走上正路”，“咱们西班牙妇女就象酒瓶：男人都想尝一口别人开了瓶盖儿的酒。可是他们买一瓶回家去，就要没开盖儿的”……作者在这些话中，道出了西班牙社会的伪善面目——道貌岸然，骨子里乃至行动上却尽轻蔑、玩弄、凌辱妇女之能事。故而《玛芭》未始不属暴露文学的范畴。

阿尔瓦罗·台·莱格雷西亚是现实主义作家，称得上是西班牙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弄潮儿了。就《玛芭》而论，他的笔触不免带有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代表作家阿志巴绥夫（1878—1927）著作的色调——“灰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是否有着当今西方流行的艺术手法上的那种所谓“超现实主义”，“摄影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倾向，那是可以讨论的。不过，他如实描写现代生活的这一点，却是无可非议的吧。

作者运用语言技巧也有独到之处。他的语言的精练，功力的深邃，可以说是叹为观止的。他有许多尽态极妍的笔墨——生动的比喻，含蓄的双关，滑稽的借代，可笑的夸张，自然的飞白等等辞格，逗人发笑，发人深省，耐人寻味。这

样的写作风格，确是别开生面，不愧为“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的幽默流派。

如果译本没有反映如此五彩缤纷的语言特色，那是译者水平不足之过。

三 本书原名叫《我是人人的姘头》(《Yo soy fulana de Tal》)。我们觉得并不大象书名，而且又没有反映书中情节的发展过程；如果作为书的结尾，倒未尝不可，但作为“点睛之笔”，作为书名，就不够贴切了。所以干脆用该书主人公的名字“玛丽亚·台尔·比拉尔”，并按她父母的缩略叫法：“玛芘”，这样似乎更能反映她的一生。

这本书跟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瑕瑜互见的，比如在对西班牙内战中对立双方的认识方面，在命意、结构、脉络、渲染诸方面，都有其不足之处，甚至有错误之处。但是可以肯定，瑕不掩瑜，它虽不能称为黄钟大吕之作，却也不失为一部妙趣横生的出色的艺术品。

译 者

1981年夏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我的生平就是一部小说，”她对
我说道。

“不错，”我表示同意，“但是一部
分册小说：分开来交给人家，先到先得，捷足先登。”

她并没有光火，因为这是事实嘛！

——作 者



写作的难处，就在于冥思苦索，要开动全副脑筋——有些小小不言的想法，只占我们脑子的很小位置，但叙述一个人的生平，就非同小可了。说真的，动笔杆，对我可是要命的事儿。

要我象常见的、真正的作家那样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两眼瞅着天花板构思立意、穷变态于毫端，那我真要发神经病了；况且他们大都是些老头儿，干别的事不中用了，所以就更容易慢条斯理，而慢条斯理则是这种工作所需要的。但在我这年龄，又那么神经质，活象四脚蛇刚被割下的尾巴，只

五分钟，就如坐针毡，连个么字还没有想出来就不得不站起来了。

然而，按照我的朋友纳蒂的启示（她说话总爱咬文嚼字），我作了几次努力，并得到一些效果。

比如昨天，当我把脑袋塞进理发店的大吹风里时，搜索枯肠，遐思冥想，终于回忆起童年时代的一件往事。

自从我心血来潮决定写我的生平以来，只要环境稍稍让我安静点儿，我总是开动机器；晚上洗澡擦肥皂，早晨梳洗整理，我无不聚精会神寻找思路。

当我独个儿乘着出租汽车驰过街道（这些街道并没有使我分心，因为我经过多次）的时候，又当我和某个使我讨厌（我知道在他身上得不到一点儿好处）的先生打交道的时候，我也总在极力思索。甚至在牙医那里（前两周我连续三天去补牙），我也一门心思地回想，但收效不大，因为我想着想着就想到那位野蛮牙医——他手持着一根铁杆，那头上有个着魔似地飞速打转的混帐小东西——会给我带来伤害。

可以看出，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点安闲的时间来从脑瓜（某些人和我管它叫作“椰壳”，另一些人和纳蒂称之为“智囊”）里挤出东西来的。最能使我安静的地方就是把脑袋打发到染头发的地方。

（这就是说到理发店去把那该死的、一个劲给我长黑发的头发根都染成金黄色。这些可恶的头发根就这么顽固不化吗？多年来，我每隔十五天就染一次，染得黄淡淡近乎银白色了，但黑头发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冒出来，黑得比重孝服还厉害。）

（常言道：造物有灵！倘若造物真的有灵，那我的头皮就用不着花那么多时间来吸收给它上的染料而会长出我所喜欢的那种颜色的头发来了。嘿！得了吧。）

问题是我每当把脑袋打发到染头发的地方去——我重复这句话，是觉得它挺风趣——就可有几个钟头来挖掘我的思想。那里是弄到讲这个故事的材料最多的地方。

不过纳蒂说我去的那个理发店是个怪店，因为它座落在“光亮头—拉斐尔街”。也许我没有纳蒂那么苛求，我觉得这店蛮好，看不到一点怪的地方。

店老板是个严肃、持重、没有什么女人气的人。马德里的上等女人都经他双手摩过——褒义而言——他叫古斯塔文，属同行中少数几个做“女宾理发师”而不自我吹嘘的人。他身为女宾理发师，却没有那种说话直不笼统的法国佬的俗气。而且价格低廉，我这不是说他收费象个剪毛工剪一头绵羊收的那么点儿。不过，一个人用不到四十个杜罗^①，便足足可以在那里度过整个下午把头发理成各种花式了。

此外，古斯塔文对顾客小心谨慎，服务周到。我晓得当许多做丈夫的来电话询问他们的夫人时，他说她们四时到七时在他店里待过，就是说还没走，还在大吹风里一时立不起来。每当这种时候他总是竭力逃避六情之网的。

当然，那天下午在理发店这些夫人的头发是没人看见的了。但是我晓得，这些可怜巴巴的、规规矩矩的太太长年累月地只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是非常单调的。所以我觉得古斯塔文所进行的是一项很值得赞扬的慈善事业：给太太们提供不在犯罪现场的，合乎逻辑的证据，好让她们享受几小时清福。

“那里有这样帅的男人，可惜不是我的丈夫……！”这些太太们想得有理。

^① “杜罗”是西班牙的一种货币，相当五个比塞塔。

确实离题太远了，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吧。题，如果我没记错，就是讲到昨天如何在理发店从舒谈的思绪中得到启发的。当时我有点疲劳，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委内瑞拉人一起去参加有两个葡萄牙人在土耳其外交官家里举行的佛兰德式^①晚会了。（哦！这位土耳其人还送给我一顶圆锥形的红帽子呢，就是象东方太监和卖地毯商人戴的那种帽子。）

古斯塔文把那大吹风给我套上并接上电源，我即开始习以为常的思索。可是由于疲乏和小马达的隆隆声，我便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我把眼睛闭上，自言自语道：“你就要睡得象根本头了。你再不去想了，今天你是想不出个鬼东西来的。”

你瞧，我让睡意给带走，灵感却来了。首先，我周围所有的东西——瓶子呀，镜子呀，镀镍器皿呀——统统看不见了；然后，各种钻入鼻腔的气味——肥皂味，洗发剂味，头发烤焦味，一概闻不到了。那么，在我脑海中仅留下的东西，便是大吹风的嗡嗡声。这种声音，在睡意朦胧中，逐渐扩大，以至变成一架飞机马达的轰鸣。

但这不是随便一架什么飞机的声音，而是我还在孩提时代听到的一架飞机的声音，这声音镌刻在我那所谓下意识的心灵上。想起那马达喘、喘、喘放连珠屁似的吼声，一连串清晰、鲜明的往事便潮水般地涌入我的脑海。这是关于我生平的最初的回忆，是我着手讲述我有生的经历所必不可少的。

^① “佛兰德式”，这里指吉卜赛式。

事情发生在一天下午。当时大概我年纪很小，顶多六岁，或许还小一点儿。

我是掐算得相当准确的，因为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下午我光着屁股坐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只有很小的女孩子才能够连件起码的衣服都不穿地坐在大街当中而不被人们哄笑，不受警察干涉的。

炎夏时节，在我们这种酷热的穷村镇里，为减轻烈日的烤灼，小孩子赤胸裸体从不认为是不雅观的。从前人们认为我们这种习惯是复古倒退；现在，自从瑞典人和其他先进的黄头发的人发现裸体有益于健康，竟把我们看作是先驱了。有时，“进步”这块烧饼儿翻个身，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提到没穿衣服坐在地上，也不光是那个下午，因为我那条街的人行道是镇上唯一铺设石板的人行道，而我没有更好的驱暑纳凉的办法，所以喜欢让臀部和双腿的皮肤饱尝石板上清凉的快意。

在我们家里，母亲准备粗茶淡餐是由大姐做帮厨的；我大姐喜爱烹调，做起来心灵手巧。

“总有一天——母亲（省略“我的”两个字，要多次重复它，未免会象一阕交响曲了）常常对我们说——康黛拉丽娅会成为公爵的厨师的：你就瞧她怎么剥野豌豆好了！”

从这里可以引申两点：我们当时是穷的，因为吃野豌豆；我们那时又是相当无知的，因为竟认为公爵也吃野豌豆。

引申为两点是妥当的：我不能确定我们当时是贫穷甚至

无知呢，还是无知甚于贫穷。一个拉·曼却^①泥瓦匠，家贫，没文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何况他每日的工资与其说是在他盖的瓦片上头，不如说是挂在半空之中呢。

因为父亲（对他也删去“我的”两个字，理由同上）干活没有任何固定的合同，也不属哪个固定的工组；不是他自己不想——人都愿意有固定的饭碗——而是因为他常轻描淡写称之为他的那个“小毛病”，所以没人肯要他。

“小毛病”这个说法就象这可怜人戴着的手套，是用来掩饰左手被砸烂的四个指头的。这四个指头还是他在某工地打短工时被砸碎的，当时他刚好把手放在起重机卸下一大块花岗石的地方。

那起重机和所有的机器一样，既粗笨又盲目，撂下那块大家伙也不向父亲打声招呼，叫他把手指挪开。打那时起，父亲卖力气赚钱的就只靠剩下的一只手和那个零头。那个零头就是左手的小指，在它的四个伙伴殉难的浩劫中唯一幸存的手指。尽管父亲想使这只小指发挥最大效力，但尽人皆知什么是小手指，那是我们压根儿不需要的丑八怪。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养家活口，这个善良的汉子不得不干些特别的粗活了。因为仿佛是弥补他那死去的四个指头，在人间却给他存活了四个儿女。即使我们的父母连一个指头都不能动弹，我们做孩子的还是天天要张口吃饭。我们就是这么自私啊！

由于父亲的精明强干，他终于成了镇子上一个顶呱呱的粗杂工，差不多从来不缺活干。我们的镇子在拉·曼却，而

^① 拉·曼却是西班牙一个地区（塞万提斯所著《堂吉珂德》一书的情节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它包括雷亚尔，托莱多，昆卡和阿尔瓦塞特等省在内。

拉·曼却村镇的房屋一般都由于气候极端恶劣，风吹雨打，不断颓圯坍塌。多亏这一点，父亲很少闲着没活儿干，我们的牙床也很少闲着没活儿干的。

种种粗杂活计都要找他：修缮石头砸碎的瓦片，用灰泥堵塞沟渠裂缝以防水的流失。

当然，干杂活取得的工钱是很少的——当时西班牙没有保护杂工这种行业利益的同业工会（现在不同，行行都有自己的工会了）。我们基本上一直是以野豌豆、甘薯和一些沙丁鱼来维持生活的。

亏得玛蒂尔德大婶，我们有了足够的衣服穿。她在雷亚尔城^①由一些傻太太办的衣物赈济处工作。这些傻太太居然这么傻，她们从来搞不清在仓库里究竟有多少衣服。关于玛蒂尔德大婶（如果不是警察至今仍把她关在监牢里，上帝是会让她心满意足的），我要记得的话将会在下面谈及。

现在我只想谈谈那个夏日下午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我把臀部墩在人行道的石板上凉快，母亲在康黛拉丽娅大姐协助下烧青菜淡饭，而父亲正在镇上哪个地方干活（写到这里，要有点条理，不要开无轨电车）。

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强烈的声响。我闹不清那轰响的缘起，因为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一位邻居（她丈夫是个邮差，她有理由更好地弄清周围的情况），冲上街头，直着嗓子仰天大喊道：

“飞机！……飞机！……”

我朝她喊的方向抬头一望，便破天荒第一次看见了往后又多次见过的东西——一架小飞机，就是战争中用来歼击大

① 雷亚尔城是其同名省的省会，位于马德里省的南端。

飞机的那种小飞机，机头上只有一个螺旋桨，机翼上闪闪地反射出钢铁的寒光。

我不由地伏下身去：只觉得它越飞越低，向我头上直坠下来了。然而，它从我头上掠过，没有碰我，只是吁吁地喘着稀奇古怪的粗气，马达部位吐出一串黑烟。

“触樵啦！”邮差的老婆嚷道，一时竟忘掉从她丈夫分发的信封上认来的几个字。

她这话倒是说中了：不多一会只听见一声猛烈的撞击，接着就是震撼镇子墙垣的爆炸声。许多人涌上大街，到处闹腾起来，我只好从人行道上站起，免得人家踩着。

“出啥事呀？”一个睡眼惺忪、从午睡中被巨响惊醒的人问道。

“一架俄国飞机，”一个明事态的人说，“机翼中弹，栽到镇郊去了。”

“掉到哪儿了？”一个跑着的人想知道，以便确定他去肇事地点的方向。

“掉到奥诺丽娜大妈的牲口棚顶上面。幸亏原先圈在那里的牲口全都在地里：骡子正在耕地，牛儿正在吃草。”

然而，我父亲这头“牲口”却没有那几头牲口走运。他这个可怜的粗杂工在飞机坠落的时候，承大妈之托，正在畜棚上面铺瓦顶，所以就变成了肉泥。

当晚我们没吃饭。一方面由于悲伤，另一方面由于母亲急于看丈夫的遗骸，把正在烧的饭菜擱在炉子上给烧焦了，而回来的时候又哭个不停。

我也哭，眼泪扑簌簌地象滑了牙的水笼头那样流淌不止。因为什么都不比大人的哭声最会使孩子害怕的了。甚至雄狮的怒吼也不比一个成年人的抽咽会使儿童产生这么大的

恐惧的。

三

古斯塔文的女见习理发员关掉大吹风(我的头发已经有焦味),我便从睡意沉沉的状态中苏醒,回到现实中来了。但是,正如那位讲话字斟句酌的纳蒂似乎说过的那样,我的脑袋在壳子里嗡嗡响,记忆就不停地涌流。所以在那位理发师花很多时间给我卷发、染发,给我镜子梳发的时候,我仍继续在脑海中看到我童年影片的片断。

片子已经老化了,破损了,遗忘了,因为在人生的影剧院中,材料很快就旧了。

飞机坠毁的消息,给镇上引来了几辆来自首都的卡车,车上载满身穿奇形怪状制服的人。通过他们,我们镇里人才晓得西班牙已经爆发了战争,一种不知为什么叫做“平民”的战争,既然这类战争差不多总是由军人操纵的。

看来,这些一律穿着蓝色“摩挪服”的人,是红色的^①。政治上的事儿就是这么怪。记得他们在奥诺丽娜大妈牲口棚的瓦砾堆里反复找了几个小时,要把驾驶那架飞机的飞行员的

^① 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是以共和国的军队和佛朗哥为首的国民军两个壁垒分明的敌对派而展开的。前者受到苏联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而被称为“红色的”,后者受到德、意、法、英、美支持;德、意、英等国还直接进行武装干涉。作者对这场战争的评论与我们的看法有明显的分歧。

尸骨收拾出来。

“既然已经摔得稀巴烂了，为啥费这个劲去收尸呢？”在场的一个人曼却人发议论说。

另一个搭腔道：“兴许把他的尸骨送回俄国，就可以再派一个来呢。”

尸骨是这里一条那里一块地陆续找出来的，这是飞机坠毁常见的糟事：除了人死之外，尸体总归是一塌糊涂的。

“可怜呀！”找的人每拣到一块就说，“尸体少许完整点儿，就不至于这么惨咯。”

“可不是么，”几个信教的妇人低声附和道，“死了的人被摔成块块，就更加犯愁了：全体死人复活的钟声一敲响，他们就会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这是明摆着的事呐。”

找尸找到一半，一种惊愕的气氛在找尸人中间骤起。

“这个驾驶员真怪！”其中一个边说边拿出刚在砖头和机身的烂铁片中间找到的一块给人看。

“我看不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另一个审视着那块东西，感到不解，“这是段普普通通的手臂嘛。”

“的确，是只手臂，”那第一个人承认，“怪就怪在这里：这是我们找到的第三只，而飞行员通常只有两只手臂。”

“在西班牙，是这样，”那另一个承认，“可这个飞行员是俄国人，而人家外国比咱先进……”

然而，当找尸者开始称赞苏联先进的时候，镇长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说那一条并不是飞行员额外的胳膊，而是我父亲借以活命的两条胳膊之一。

找尸的人有点泄气了，但从那时起便把捡回的尸骸分成两小堆：一堆是飞行员的，一堆是泥瓦匠的。所谓肥水不流别人田，所以我怀疑那些军人从中渔利，把不是军人的遗骨